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蘇俄動態述評

doi:10.30390/ISC.198211_22(2).0010

問題與研究, 22(2), 1982

Wenti Yu Yanjiu, 22(2), 1982

作者/Author：塔其

頁數/Page：96-9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2/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211_22\(2\).0010](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211_22(2).0010)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塔其

中蘇共會談

九月廿六日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向阿塞拜疆共和國致贈「列寧勳章」時，在該共和國首府巴庫發表的一項演說中，再度向中共提出和平的召喚。布魯在此一演講中指出，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是目前莫斯科亞洲政策的主要目標。他說：「我們認為在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礎上逐步改善蘇、『中』關係，使之正常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繼而，十月五日「塔斯社」公佈說，布里茲涅夫與越南國務委員會主席長征在克宮會談期間一致同意，越南與中共、蘇聯與中間關係的改善，符合三個國家的利益。這是布魯在十天內第二次對中共提出改善關係的呼籲。

中共在今年九月召開十二全大會時，胡耀邦在對大會的報告中，曾有一段講詞提到「中」蘇關係。他說：「中蘇兩國關係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是友好的。中蘇關係演變到今天這樣的局面，是由於蘇聯執行了霸權主義政策。……我們注意到蘇聯領導人一再表示願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但是，重要的是行動而不是言辭。如果蘇聯當局確有誠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並採取實際步驟解除對我國安全的威脅，中蘇兩國關係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鄧小平在九月下旬曾告訴當時訪問北平的日本鈴木首相說，莫斯科與北平間的關係不可能有太大的變化，並說有四個因素妨害中蘇共雙方關係的進展，那就是：(1) 部署在中共邊境的大量蘇聯軍隊；(2) 蘇聯進軍阿富汗；(3) 蘇聯的扶持外蒙；(4) 莫斯科支持越南軍隊入侵高棉。雖然如此，中共當局仍將十月四日到訪的蘇聯副外長伊利契夫 (Leonid F. Il'yichev) 的訪問性質由私人提高至官方層次，並宣稱伊利契夫將與中共副外長錢其琛就「中蘇雙方關係的問題進行談判。這項談判是雙方自一九七九年以來的最高階層談判。至於是否會有突破性的進展，則受到下列一些因素的影響。

六〇年代中共與蘇聯關係決裂後，雙方開始猛烈地互相抨擊對方，如「修正主義」或「教條主義」。一直到一九七九年雙方才有關係正常化的談判，但因該年十二月蘇聯進軍阿富汗，談判旋即破裂，到今年才又有布里茲涅夫的二次示好舉動。中共一向堅持蘇聯先放棄「霸權主義」，雙方才有和好的可能；並聲言，只有蘇聯的「具體行動」才能解決雙方的分歧。就後者言，顯然是要對鄧小平所提的四點障礙給予合理的解決。如今，在蘇聯沒有放棄霸權主義，且未作出任何「具體行動」前，中共願意坐下來談判，顯然有其目的：(1) 為求國內「四化」運動的完成，需要與北方的蘇聯保持一種和諧關係；(2) 給美國一個警告，那就是中蘇共的衝突也許不是永久的，在適當時機下，兩個共黨政權也許會合作。

蘇聯頻頻地向中共呼籲改善關係，自也有其打算：(1) 美雷根總統對蘇聯的強硬態度，使其在亞洲、中東的勢力受到挫折，自己國內的政治、經濟受到壓力，因此積極拉攏中共，可增加其外交聲勢，並可較機動地調動「中」蘇邊界上的大軍；(2) 藉外交策略的一種逐步、審慎的改變，而緩和其東線的緊張。如今，蘇聯與中共的第一階段談判已告結束，雙方共舉行過六次會談，但並沒有可察見的結果。下一階段談判將在莫斯科舉行，明確日期

則未宣佈。

目前中蘇共雙方雖都作出希望和解的姿態，但實際上雙方的和談距離實際目標尚遠，其因有三：(1)中蘇共雙方領導階層對「和解」問題尚有分歧，雙方很難作出重大讓步或採取果斷行動，以打破目前的僵局；(2)儘管目前中共與美國有所衝突，但美國並不威脅中共的安全，蘇聯則不然，它繼續對中共採取包圍的策略，此不僅在政治上，亦且在軍事上對中共頻增壓力。因此，中共當然也明白，它沒有必要爲了要刺激美國，而引入蘇聯；(3)儘管中共冀求和平的國際環境以從事經濟建設，因而也願意降低與蘇聯的衝突情勢，但中共要的是美國與西方的資金、技術及市場，如果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拉得太近，很難保證其與西方目前的經濟、技術交流不受到負面的影響。基於上述理由，「中」蘇關係的改善將是有限的。

美、蘇外長會晤

蘇聯外長葛羅米柯 (Andrei A. Gromyko) 於九月廿八日、十月四日分別與美國務卿舒茲舉行會談。據一名美國高級官員聲稱，葛羅米柯和舒茲花了很多時間檢討在日內瓦進行的限武談判，並討論了蘇聯在波蘭、阿富汗與高棉的角色、人權問題與生化戰等問題。葛羅米柯曾於十月一日向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猛烈抨擊美國，並稱雷根的中東和平建議只是爲以色列安全着想的策略。從這次的演講中顯示出，他與舒茲九月廿八日和接下來的十月四日會談，對緩和兩國間的緊張關係不會起太大的作用。

此次兩國外長在紐約的會談是美蘇於聯合國大會開會期間的例行活動。儘管如此，這二次的會談仍然反映出了兩國目前的關係。在會談中，雙方同意的事項非常有限，唯一達成協議的是他們都希望伊朗和伊拉克的衝突儘快結束。幾個月前，雙方要努力促成的兩國首腦會晤，現在提都不提了。美國務院官員在會談後表示「雙方關係在緊張狀態之中」，蘇聯官員則更直接了當地表示「目前雙方關係處在歷史上的最低點」。造成兩國關係緊張，當然有很多因素。自雷根總統上臺後，美國即採行強硬外交路線，使莫斯科難以從「緩和」中得到好處。舒茲且在十月十八日公開宣稱，最近共產國家的政局發展顯示出民主改革或革命的新時代就在眼前，並稱這是美國的責任，應對共產國家的求救提供協助。這等於是鼓吹蘇聯附庸國採行民主改革，脫離蘇聯。雷根總統且極力鼓吹增加國防費用，以對抗蘇聯的軍事擴張。這種情況自然讓蘇聯不悅；而美國對蘇聯的進兵阿富汗及干預波蘭亦深感不滿。

由於年來外交政策上的乏善可陳，威信蘇聯當局已有重新評估其外交目標的趨勢。美蘇關係的凍結，使蘇聯必須尋求與其它國家建立較密切關係的可能性。而蘇聯軍方亦對和解的價值表示懷疑。他們率直的表明，蘇聯不應爲了要與西方迅速達成協議，而縮減國防經費。然蘇聯的經濟狀況能否維持其不斷增加的軍費支出，却也是蘇聯的經濟策畫者所擔憂的。總之，美蘇外交關係的惡化，必然增加蘇聯國內、外的問題與困擾。

蘇聯農業生產情形

蘇聯農業部長麥夏茨 (V. K. Meysats) 於農業工人節的前夕，在莫斯科的一項農業專家會議上演講時指出：「我們應該自我批評地承認，過去一年來，很多地區、專區以及個別共和國的農產品產量，都低於原定計劃」。西方農業專家說，麥夏茨的這段話等於是間接承認今年的穀物收成將是連續第四個歉收年。麥夏茨說，哈薩克斯坦特別受到「極端複雜」的天氣所打擊，但他亦同時指稱，把歉收情況完全歸咎於今年的天氣是不正確的。這位農業部長說，天氣是無法改變的，但所有的農場應該採用業經證明正確的技術。他並未估計預期的穀物收成有多少，但由於哈薩克斯坦是蘇聯主要春麥產區，因此，蘇聯勢難達成其一九八二年的二億三千八百萬噸的穀物生產目標。

爲了提高農業生產量，蘇聯已盡了一切努力。雖然氣候不好影響穀物的收成（在蘇聯同一土地一年只有一作的收穫），但僵化的制度則使情況更爲惡劣。由於實施中央計劃經濟及國營農場、集體農莊制度，農民只能按計劃行事，無法隨時因天候而對糧作實行有彈性的調整，更由於缺乏利潤動機，農場管理也是敷衍了事。但如果要更動經濟制度，也有困難，那就是：在位者已忘了市場經濟是怎麼一回事，而農場工人又已習慣了聽令行事，而難於發展各自決定農業目標所需的那種能力。

據估計，蘇聯今年的穀物輸入量將達四千四百萬噸，即是付出至少六億六千萬美元外匯以購買此數量的穀物，這對蘇聯不僅是經濟上的負擔，且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但更嚴重的是糧食不足所引起的工人不滿。最近幾年已出現有罷工或消費者示威，這加重蘇聯必須向美國或其它西方國家購買穀物的壓力。而對美國穀物輸入的依賴，使得華盛頓想藉此以爲政治武器，迫使蘇聯在某些方面讓步。就長程言，這種依賴關係愈大，則蘇聯受制於美國的機會也愈大。蘇聯領導層當然也清楚這一點，故其在振興農業上花費無數。然氣候是人力所無法改變，而中央計劃經濟是共黨的既定政策，要改變又談何容易。因此蘇聯也只能從發展技術與激勵農民提高生產率上着手，而效果如何，則有待事實證明了。

越南長征訪問蘇聯

越南國務委員會主席長征應蘇共中央委員會、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邀請，於十月四日率領黨、政代表團抵達莫斯科，作爲期五天的官式、友好訪問。五日，雙方在克宮舉行會談；六日，越南代表團前往基輔參觀訪問；八日雙方發表蘇越聯合公報。當天，代表團結束整個訪問活動。

此次越南國務委員會主席訪問莫斯科之際，正是蘇聯副外長抵達北平磋商「中」蘇關係的時候，這種時間上的巧合，顯示出越南對其主要盟友蘇聯與其死敵中共的修好步調的嚴重關切，也令人不禁要對蘇、越、中共的三角關係加以探討。首先就中越共關係而言，長征是越南的政府首腦也是首席的反毛理論家，他曾在今年二月十七日越共黨報「人民報」刊文指出，目前中共領導人推行的毛澤東思想已完全不像原來的毛澤東思想了。似乎越共在意識型態方面已準備妥協了。越南會一再建議恢復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中斷的「中」越對話，以及與北平商談和約。十月八日越南副外長黃碧山在聯大一般性政治辯論中發言時指出，越南主張儘快的恢復「中」越談判，爭取關係正常化。但在此以前，十月五日河內電臺指責過去三個月中共向南進行了數千次的武裝挑釁和入侵。中共則指稱越南應單獨承擔「中」越邊界糾紛的責任，並反對越軍駐防柬埔寨。因此，橫在中、越共間的最大糾結是邊界問題與高棉問題。

蘇越關係近來亦有低降之勢。由於越南在高棉陷於泥淖之中，不免要求蘇聯提供更多的援助。然最近幾年蘇聯的對外負擔增多，對於越南的物資援助要求不僅未答應，反斥越南「無能」。另外，越南想把寮國、高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蘇聯對此二國也有意直接插手，對於越共當局過份強調印支三國的特殊關係，不滿之情溢於言表。雖然如此，長征的這次訪問活動仍然受到隆重的接待，長征與布魯且一致同意蘇聯與中共、越南與中共間的關係改善，符合三個國家的利益。不管這是越南的本意與否，身爲附庸國在蘇聯欲與中共改善關係之際，也只有在一旁隨聲附和了。而此次訪問的意義乃在於蘇聯仍希望與河內有一種密切的關係，而越南則希望蘇聯能保證在「中」蘇會談時，不以犧牲越南來達成交易。

蘇聯支持波蘭軍方鎮壓行動

蘇聯國防部長烏斯汀諾夫在波蘭現代軍隊建立卅九週年紀念日（十月十二日），向波蘭軍方領導人賈魯塞斯基發出的賀電中指出，蘇聯將全力支持波蘭控制騷亂的鬪爭。這份電文並列於蘇聯「紅星報」上。他在電文中說：「無可置疑的，國內反革命和帝國主義勢力的所有計劃，都妨

礙波蘭社會主義的建設、削弱社會主義合作的團結和凝聚力，然這些計劃是註定要失敗的」。他並說「作爲華沙公約成員國的波蘭必能得到蘇聯的充分支持和協助」。

波蘭人民在今年八月團結工聯成立兩週年時，響應團結工聯地下領袖的呼籲，在各地分別舉行了反政府示威。使得波共政權再度採取強硬手段對付示威者，在一連串的示威後，計有五千餘人被逮捕，其中三百人遭判刑。八月中旬波共頭子前往蘇聯克里米亞拜會布里茲涅夫時，曾獲布魯保證，克里姆林宮將繼續對華沙共黨政權提供援助。九月中旬在對波蘭議會的一項報告中，波蘭內政部長齊茲拉克（Czesław Kiszcak）指出，團結工聯地下領袖拒絕了戒嚴法當局的秘密會談建議。這都顯示了人民對波共的不滿與疏離。而波共內部對「團結工聯」潛在影響力的處理方式，又有三派不同的意見：(1)解散「團結工聯」，並完全禁絕它的重生；(2)在訂定的規章之下，讓「團結工聯」恢復活動，但禁止它扮演任何的政治角色；(3)在波蘭經濟恢復穩定之前，暫時不考慮「團結工聯」或工會運動的問題。

顯然的，不管波共採取那一種方式解決團結工聯問題，都須先與蘇聯有一番磋商。雖然這一次蘇聯國防部長在賀電中表示支持波共的措施，但這似乎是一種政治姿態和道義上的支持，而不是提供具體援助。波共既受制於克里姆林宮的命令，又得不到實質援助，在面對其國內的政治、經濟問題時，真是徒呼奈何了。

蘇聯憲法節

十月七日日是蘇聯憲法節。當日「真理報」社論以此爲題發表專論，文中指出，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的發達社會主義社會的「新憲法」乃是長久以來蘇聯鞏固民主政治的勝利象徵。這部憲法將是繼續發展和加深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工具。憲法中明白規定蘇聯的所有權力歸於人民，每個蘇維埃公民都享有充分的權力與自由。「爲人民」是新憲法的重要核心。文章末並稱，蘇聯的憲法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它是其它勞動者國家的範例。

蘇聯在一九七七年憲法之前還曾經有過三部憲法，分別是：一九一八年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在此一憲法中，規定國家權力屬於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並廢除土地私有，論及人民基本權利、義務，及中央權力組織，類似的憲法在一九一八—二二年間，分別爲白俄羅斯、烏克蘭、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喬治亞等共和國所採用），一九二四年聯邦憲法（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卅日各個共和國組成聯邦，而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三日批准憲法），一九三六年史達林憲法（此一憲法界定蘇聯爲一工農的社會主義國家，並第一次形容蘇聯共產黨是國家領導者）。一九七七年憲法早在一九六二年就進行了準備工作，但草案遲至一九七七年五月才告完成，經過「公開討論」，同年十月批准通過。在這部憲法中反映出戰後社會與工業的變遷，並比較強調個人權利。

雖然在「真理報」社論中對蘇聯憲法推崇備至，但它是否能發揮效力，却不無疑問。例如一九七七年憲法第三十九條第二節：公民行使權利與自由，不應損害社會、國家的利益，以及其它公民的權利。蘇共可因對此一條文的廣泛解釋而對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加以剝奪。（如指其行爲危害社會、國家的利益是最慣見的伎倆）。第六條：蘇聯共產黨是蘇維埃社會的領導、指引力量，是其政治體系、所有國家、社會組織的核心。蘇共爲人民而在，同時也爲人民服務。此一條文使蘇聯共產黨獨得絕對的統制力量。我們可說蘇聯整部憲法的遵守與實施均在便利共產黨的操縱，其公民權利和民主程序在事實上都是虛假的。一九一八、二四、三六，乃至於今的一九七七年憲法純爲一形式體制，所謂蘇維埃統治全國，事實上却是共產黨專政。